

重器物贵实践的思想家

——晚明的文化守夜人王夫之（上）

□ 胡森森

1692年2月18日，农历正月初二午时，74岁的王夫之卒于湘西草堂，终身没有剃发。是年十月，葬于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，墓碑上篆刻着王夫之自作的“遗命墓铭”：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，其左则继配襄阳郑氏之所附也。自为铭曰：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，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。幸全归于兹丘，固衔恤以永世。寥寥几语，话尽了王夫之历经江山兴亡、沉郁顿挫的沧桑坎坷。这位一生为故国守节、为文化守夜的孤独行人，在中国思想史的星空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，越是时间推移，越是泽被后世、影响深远。

变局中的思想家

王夫之的父亲——武夷先生王朝聘出身士人阶层，是治春秋学的专家，但仕途并不显达，中秀才后七试乡闈不第，遂绝意仕途，以讲学教授为乐，像所有中国读书人一样，将希望寄托于子嗣身上。三个儿子，介之、参之、夫之，从小接受私塾教育，被寄望于读书成才、报效国家，完成父辈的抱负。王夫之兄弟成长过程中，虽偶有叔父王廷聘老庄思想的调剂，但从未更改过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“父之道”。奈何天道不遂人道，崇祯晚期的小冰河气候导致饥荒，赈

济与克扣交织缠绕、天灾与人祸恶性叠加，由荒政失序带来民变暴动，加上君臣上下、朝野内外互相猜忌，一个刚刚恢复元气却千疮百孔的帝国、一个励精图治却又志大才疏的君主，最终被内忧外患拖垮。江山易主、鼎湖弃世、外族入关，大顺、大西、大明、大清四个政权厮杀混乱，南明福王、唐王、鲁王、桂王等政权相互倾轧，在内耗中燃尽最后一点枯油，随着一次次失败，华夏衣冠和自信日渐凋零。

“叶叶飘零都不管，回塘早似天涯远”，在激烈的变局中，王夫之横空出世，完成了一名哲学家、史学家、思想家的心路历程，其成就涵盖经学、史学、哲学、文学诸领域。王夫之既深刻影响了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史，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发展的走向，其开创的“湖湘学派”实事求是、匡世济民的风骨与追求，也永远镌刻在了中国文化地图之上。

天下唯器的世界观

从世界观来看，王夫之继承并发扬了张载气学思想，提出了“气一元论”，把宇宙视为由元气构成的物质实体，气永恒不灭，有状态变化而无生灭之别。这种观点兼具唯物论和辩证法，十分接近近代自然科学关于物质与能量的观点。由“理气为一”得出“天下唯器”的结

论，创立了别开生面的“道器说”，一举打破程朱理学以道为上、以器为下的旧说，强调物外无道、道在物中，“道者器之道，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”等命题，达到了古代中国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峰。

夫之哲学有家学亦有师承，直接上承北宋张载为代表的陕学。张载的气学思想从来不是主流。王夫之将张载的世界观发扬光大，并迅速跳至方法论层面和伦理学领域，把实用理性作为哲学的依归所在，主要体现在：把哲学的讨论领域拓展到实体问题；把器的范围扩大到自然和社会，加入“人”这一重要的参与社会实践的“物质”范畴；把人的价值意义与社会意义联系起来，解决了知之而后行的问题，使知行由分裂走向合一。器与物的理论，既是王夫之关于物质与精神的理解，也是关于实践与认识的理解。

知先行后的实践观

从实践观来看，由物质第一性的世界观原理，自然会得出实践优先、行动至上的方法论。同样，王夫之由“天下唯器”得出“知先行后”的结论。具体来讲，天地间存在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，一般存在于具体之中，但具体并不依附于一般，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别只是“名”而不是“实”，不意味着界限分明、等级森严；人性亦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，人性形成不全是被动的，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。王夫之通过对《易经》等中国典籍蕴含哲学精神的深入挖掘，由朴素的唯物世界观得出了朴素的辩证方法论。

“器”是“道”的前提和基础，这里的“器”有“物”的味道，包括自然与社会。先存在有形的“器”，然后才是无形的“理”。儒学的传统观念“君子不器”，弊端就是奢谈性理，但于国于民于事无补。顾炎武就曾批判过阳明心学的弊端，认为其导致晚明浮夸虚华学风，人人只向“心”上用力，却不习实务，毫无经世致用的本领，在做圣人的迷梦中荒废了求知向学。王夫之与顾炎武在经世致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，批判阳明学说为“禅”，将其作为“人心之坏，世道之否”的原因，以陆九渊出而宋亡，暗指“王学”破坏学风、断送天下。

正如“道者器之道，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”一样，“行可兼知，而

知不可兼行”，主从关系一目了然，立场鲜明，避免了二元论的调和。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和阳明哲学的知行合一观点，前者使人皓首穷经，以博闻强识为能事，向书本讨生活，以科举为最高追求；后者则有混淆知行界限，把知等同于良知，省略忽视勤勉的力行功夫的弊端。无善无恶的圆融之理，在阳明时代尚可理解为自然朴素，但在晚明则有狂妄之险，把知即是行的观点推向极致，则带来满街圣人却无人可用的空疏散漫。王夫之的“行先知后”，从知行关系上较王阳明知行合一又前进了一步。虽不如阳明哲学机锋巧妙，却更为朴素自然。“知行相资以为用，并进而有功”，则是在区分知行二者界限之后的统一，使这组矛盾在清晰而非混沌中相资互用，融为有机整体。

名实合一的知识论

从知识论来看，认为人不可能生而知之，“心出思而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”，只有进入到世界万物之中，才能探求得到事物的规律；真正的知识是名和实的统一，概念的背后是现实，“知实而不知名，知名而不知实，皆不知也”。王夫之主张“训诂必依古学”“义理可以日新”，提出考据与义理并重的学术路径，在解经、释经、传经上形成了独特方法论，开清代考据学与后世胡适“大胆地假设，小心地求证”之先河。他认为，不事名物训诂便无以通经，重视解释经典的文本，反对主观臆测态度，他用以形求义、因声求义，比较互证等方法作《诗经稗流》《春秋稗疏》，查遗补缺，还经典以本来面目，以“六经”为依托寻找义理，构建体系。从《周易》中批判佛老，提出“天下唯器”的道器观，从《尚书》中提出“行可兼知”的知行论，从礼学中倡议人性自然，从诗经中强调真情性情，从春秋的夷夏大防中推出仁智与礼义的分别，得出夷夏别在“礼义”的观点。王夫之以实学为基，以理学为要，进行了构建“中国解释学”的最初尝试，开启了实事求是、经纶致用的湖湘学风先河，对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乃至现代科学意识的产生具有深远影响。

人物志



卧读的郑振铎

笔者喜欢读名人书信，这些书信里不仅有他们色彩斑斓的生活，更有其与众不同的性情与操守。

1941年，著名作家、收藏家郑振铎致信重庆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，信中这样写道：“森公在此，每事请益，获裨良多，至感愉快！几于无日不聚，聚无不长谈。奇书共赏，疑难共析，书林掌故，所获尤多，诚胜读十年书矣。惟近有一事，惟使弟深感不安。为弟之立场计，不敢不慎重声明素志。盖顷从某友许获悉森公曾去函尊处，述何先生意，欲按月付弟以若干报酬。此事殊感听闻！弟事先竟不知情……弟来发读书，尚明义利之辨。一腔热血，爱国不敢后人。一岁以来，弟之所以呼号，废寝忘食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，纯是一番为国效劳的心。若一谈及报酬，则前功尽弃，大类居功邀赏矣，万万非弟所能闻问也……国难未已，分金均宜爱惜，我辈书生至今尚得食国祿，感恩已深，虽此间生活程度颇高，然量入为出，差足仰养俯育，更不宜乘机取利，肥自肥家。读书养气，所为何事！见利忘义，有类禽兽。良知未泯，国法具在，务恳吾公成全弟之私‘志’，感甚！感甚！”

为了让大家明白此信的前因后果，这里将相关背景交代一下。日军攻陷上海后，大量文物特别是中国古典文献遭到毁坏，幸存下来的，又被日伪及美英驻华机构高价收购或强抢，大箱大箱运往海外。看到祖国的文献遭逢如此劫难，暂留上海的郑振铎心急如焚，他联合同样具有家国情怀的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、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（即信里提及的“何先生”）、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人，暗中成立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，全力抢救珍本、善本图书，并争取到中央图书馆和中英文教基金会的拨款资助。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成立一年时，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、国学大师徐森玉（即信中说到的“森公”）受命从重庆前来上海，秘密参与对珍贵文献的甄别、验收、抢救。这些爱国人士取得的成就就是非常可观的。

1940年12月23日，郑振铎、徐森玉、何炳松联名向中英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朱家骅、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汇报说：“本月廿日止，已得……善本书总计三千种，内宋密三十种，密藏孤本不少。”郑振铎“奔走最力”，使用的公款又全部用来购买图书、车船、联络等费用“从未动用公款一钱”，徐森玉与何炳松深受感动，他们建议重庆当局给予郑振铎适当补助。郑振铎寄给蒋复璁的



信，就是针对徐、何的建议而写的。

读完郑振铎的来信，蒋复璁非常敬重，他深知身在沦陷区的郑振铎生存非常困难，温声劝他收下这笔并不丰厚的补助。郑振铎回信说：“书生报国，仅能收拾残余，已有惭于前后方人士的喋血杀敌者矣。若竟复以此自诩，而贸然居功取酬，尚能自称为‘人’乎？望吾公以‘人’视我，不提报酬之事，实为私幸”，再次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笔钱。

世界上应该有两种财物，一是不义之财，一是合义之财。所谓不义之财，就是没有蕴含足够的血汗，不符合道德、法律的钱财，不当补助、贪污、受贿、敲诈、欺骗所得都属于此类。所谓合义之财，是指以个人诚实的劳动作为支撑，无损公平正义和世道人心的钱财，中央图书馆准备给予郑振铎的那笔补助就属于这种类型。拒绝不义之财，多数人可以做到，毕竟拿了这样的钱，可能遭人白眼甚至受到社会的追究。谢绝合义之财，一般人很难做到。原因很简单：人生在世，处处都需要金钱，拿了合义之财，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，又不会引发别人对我们的负面观感。正因为如此，一个人能像郑振铎一样拒绝合义之财也就到了一种别样的高度。

郑振铎先生写给蒋复璁的信犹如一盏明灯，堪为后来者学习的榜样。

公的雄心也逐步膨胀起来。

崤山之痛

春秋时代，称霸模式的核心要件是要得到周王室的认可，凡有此志的诸侯都要极力尊崇周王室。公元前636年，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勾结戎或叛变，周襄王出逃郑国。这对于周王室是灾难，可对于那些有想法的诸侯大国，可谓是天赐的表现机会。

秦国得到消息，穆公迅速集结精锐，准备东进勤王，护送周襄王回京。晋文公同有此心，在重臣赵衰的建议下，抢先出兵，击杀王子带，把周襄王平安送回都城。穆公又一次起个大早，赶个晚集。二十年里，两次教训，穆公痛感，秦必须要在中原有个落脚点。

公元前630年，秦协助晋国讨伐郑国，被烛之武一番游说，明白了“亡郑厚晋”的道理。随后，秦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与郑结盟，成为郑国的“保护神”，还派遣杞子、逢孙、杨孙三将驻防郑国，秦军第一次在中原驻扎，似乎离周王室更近了一步。

当晋文公去世，杞子又飞报郑国防守空虚时，穆公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不顾百里奚、蹇叔等老臣的劝阻，决定千里奔袭郑国。

正如蹇叔哭师所说，崤函通道的东端、崤山要地还在晋国的绝对控制之中，这是打伏击战的绝佳场所，秦军出入此地将会命悬一线。穆公认为按照周礼，晋国不会在晋文公大丧期间出兵，秦军可以安全通过崤山。但秦没有派人吊唁晋国，反而攻击晋的同姓之国郑国，有违周礼在先，那么晋国也就不必在意周礼之约了。

远绝山河，袭击郑国，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这是秦军历史上少有的冒险行动，也是秦军的一次空前惨败。几乎无功而返的秦军，回师途中在崤山遭遇晋军和戎族的南北夹击，全军覆没。惨痛的教训让穆公彻底清醒：在完全控制崤函通道之前，逐鹿中原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崤之残余波未平，秦晋之间又连续进行王官之战、彭衙之战、新城之战。秦虽小有斩获，挽回了些许面子，但始终无法获得崤函通道的绝对控制权。君子豹变，秦穆公把目光从崤函收回，放眼全局，寻找更为有利的支点，格局为之一变。东方不亮西方亮。穆公暂时放缓了东进的脚步，转而向西，潜心经营渭河平原；转而向南，与“敌人的敌人”楚国共谋发展，这两大举措深刻改变了秦国的前进道路，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。



支点之争

□ 崔庆

襄公立国之后的百年，秦人沿着渭水一路向东，随之汇入真正的大河——黄河，天地为之一宽，但

挑战也更加复杂。秦人的潜在对手不再仅是戎族，而是还要直接面对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晋国。

秦人特别希望冲出渭河平原，看一看更加广阔的天地，他们特别希望找到一个支点，撬开进军中原的大门，这个支点就是崤函通道，秦晋百年相争的源头。

醉翁之意

晋国有称霸中原之心，秦力图东扩，两强角力的焦点在贯通东西的崤函通道，这是秦国从渭河平原走向中原的必由之路。崤函通道之中，地势险要，虽然还未有后世的函谷雄关，但已是易守难攻之地。公元前659年，秦穆公刚刚继位，就打响了争夺崤山的第一枪。穆公元年，“自将伐茅津，胜之”。

年轻的穆公眼光独到，抓住了崤函通道的重中之重。茅津位于崤函通道的东端，崤山西麓，黄河在此急剧收窄，设有茅津渡。茅津渡在东，太阳渡在西，晋国要渡过黄河，进入中原，必然在这两个渡口选择其一。秦以讨伐戎族的名义对此进行刺探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小小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强大的晋国。同为雄主的晋献公敏锐地察觉到，秦穆公绝非等闲之辈，如果任其“野蛮生长”，必定会成为晋国强

劲的对手。于是，茅津成为秦晋针锋相对之地。

两灭虢国

公元前658年，也就是秦取得茅津之胜的第二年，晋国第一次“假虞灭虢”，借道位于中条山的虞国，吞并了位于黄河北岸、茅津渡上游的虢国下阳城。在此之前，晋已经修建了“河外列城五”，沿黄河构建起了完备的防御体系，晋公子重耳遵从父令镇守河外，牢牢掌握崤函通道的控制权。

晋国一面强硬地巩固河外之地，一面也不忘安抚“年轻人”秦穆公。晋国行动有条不紊，但气势逼人，穆公深知秦晋实力相差还十分明显，及时改变策略，秦晋两国关系很快缓和下来。公元前655年，秦穆公迎娶了晋献公的女儿，原本暗中较劲的两国结为秦晋之好。

姜还是老的辣！就在秦穆公还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，晋献公第二次“假虞灭虢”，渡过黄河，吞并了南岸的上阳城，彻底灭亡了虢国。晋军回师途中，出其不意又吞并了虞国。数年之间，晋国完全控制了河东地区和崤函通道，完全堵塞了穆公东进之路，成为秦的肘腋之患。秦穆公起个大早，赶个晚集。

现实比剧本还要精彩。就在穆

公感叹难以对付晋献公的时候，虞国亡臣百里奚、蹇叔先后入秦。穆公如获至宝，让百里奚主持国政，号为“五羖大夫”，蹇叔为上大夫。同年秋，秦军攻晋，战于河曲，此后秦晋两国形成了两强相持的状态。

三置晋君

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黄河多变，秦晋关系也纷繁复杂，关键就在河西河东之地，本质是夺取崤函通道的控制权。穆公对此念念不忘，时刻关注晋国时局的变化。

晋献公精明于外，糊涂于内，没有处理好君位继承问题，在其之后，晋国陷入长期动荡。晋公子夷吾为了能够得到穆公的支持，开了一个“不能拒绝”的条件：河外列城。只要穆公能够帮助夷吾继承晋国君位，他愿意把晋国在控制崤函通道的整个外围防御体系“河外列城”出让给秦国，这实在太具有诱惑力了。

成为晋惠公的夷吾没有履行诺言，甚至想在秦国饥荒的时候趁火打劫。忍无可忍的穆公发动了韩原之战，终于取得了晋国的河外列城以及河西之地。穆公二十年（公元前640年），秦国又吞并了梁、芮两个小国，进一步巩固了对于河西之地崤函通道的西端的控制，同时穆